

一個新的典範——

《史學評論》「代發刊辭」的再反省

黃克武

余英時《史學評論》發刊辭與民國十七年傅斯年所寫「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具有同樣的意義，而性質上則類似民國十二年胡適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余氏發刊辭（下簡稱余文）的基礎是透過對史料學派（即傅斯年所謂「史料即史學」的看法）和史觀學派（主要指唯物史觀，以馬列思想解釋中國歷史）的反省，進而指出中國史學研究的新路向。

今日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都已經到了「技術崩潰」（technical breakdown）的局面。就史料學派而言，民國六十一年思與言雜誌社舉辦「二十年來我國的史學發展」討論會，臺大杜維運教授就含蓄地指出「近二十年來，不可否認的，考據學仍然是史學的主流」，但是「考據學風下，史學家容易陷在史料與枝節問題裏面，而不能高瞻遠矚地看歷史的發展」；師大李恩涵教授則明確地表示：「歷史為史料學」的時代已經過去，史家在史實重建之外還應從事解釋的工作。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①近十年來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新動向，更使許多史學工作者不再同意傅斯年的主張。就史觀學派而言，民國四十三年中共《歷史研究》發刊後，中共史家不斷地以馬、毛思想為基礎從事歷史研究，把中國的史實套入唯物史觀的歷史階段論之中，史學淪為現實政治的工具；到了民國六十六年，隨著四人幫的倒臺，又開始批判這種史學，認為是「古為今用」、「影射現實」、隨心所欲地偽造歷史，在政治浪濤的衝擊下中共史學搖擺不定；最近又產生了新的反省，喊出「實事求是」的口號，因此目前鼓勵文物的發掘、實際的調查、資料的蒐集等工作，我們發現中共史學似乎又從史觀學派折回史料學派的舊路。在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逐漸為人放棄的時候，余文的提出為中國史學界指出一個新的路向，對未來的發展具有深刻的意義。余氏曾指出：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對民初史學界而言有「典範」(Paradigm)的意義^②，今天我們則認為余氏《史學評論》發刊辭同樣地象徵著一個新典範的宣言。

余文對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的批評大致有以下幾點：

(1)就歷史研究的目的而言：史料學派以史料之蒐集、整理、考訂、辨偽作為史學研究的中心工作，當一切事實考證清楚，歷史真象自然顯現；史觀學派則為運用中國經驗來「證實」馬克斯「一般性的歷史哲學學說」。

(2)就史學與時代而言：史料學派為史學與時代脫節，置現實於不顧；史觀學派則為兩者結合

①「二十年來我國的史學發展討論會記錄」，收入《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臺北，食貨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頁三七六—三八三。

②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載《聯合月刊》，第二十七期(民國七十二年十月)。

的過份密切，史學爲現實服務。

(3)就方法論上的主客關係而言：史料學派對史學之客觀性認識不足，以爲將事實考訂清楚就是絕對的客觀；史觀學派則過分的主觀，將歷史視爲任人予取予求的事實倉庫。

英國史家柏林 (Isaiah Berlin) 把一切思想家和作家分爲兩大類型，一是刺蝟型，這一型人喜歡把所有東西都貫穿在一個單一的中心見解之內，他們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後全都歸結到一個一貫而明確的系統；一是狐狸型，他們從事於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個一貫的中心系統。^③以柏林的「刺蝟」與「狐狸」來看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其密合的程度較余氏《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的運用有過之而無不及，「狐狸」正是知道許多雜事的史料學派，「刺蝟」則爲祇知道一件大事的史觀學派。

余文在反省之後也指出了新的展望，認爲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史觀則爲其上層建構，兩者合則雙美，離則雙傷。歷史研究的目的是在衆多歷史事實中，發現它們之間主從輕重的複雜關係，以說明歷史之變化與發展，此即傳統所謂「疏通知遠」和「通古今之變」。所以今後中國史學研究應「認清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過程，並透過對過去的了解而照明今天的歷史處境」。這一點又牽涉到史學與時代的關係，余氏認爲史學應配合時代，但史學與現實之間又必須保持適當的距離，因爲史學有其紀律與尊嚴，應負起批導時代的責任。再就方法論的主客關係而言，余氏主張主客交融，將疏通工作建立在史料考訂的堅固基礎之上，以一家之言來貫穿古今之

③ 轉引自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頁六九—七〇。

變。余氏提倡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也奠基於這種看法。

余文的提出是承舊，也是創新，它一方面代表中國史學傳統中章實齋至錢穆史學觀念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在此基礎之上以開放的心胸融入了許多新的見解。在承舊方面我們先探討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的傳統淵源，再進而追溯章、錢史學對余文的影響。

史料學派雖受到德國蘭克史學的影響，但與清代考證學風更有血脈相連的關係。傅斯年就明確地指出：史語所工作的第二條宗旨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④顧亭林（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提倡「博學於文」，認為學問的範圍包括至廣，不僅指一切文字記載的書籍，而且包括宇宙間一切事理事物，他在經、史、音韻、訓詁、金石、地理的成就，為清代考證學開創了新方向，而治學的方法，如「以證據普遍歸納」、「反覆批判」、「探求本源」、「實地考證」等，皆為考據學家所師法。^⑤閻百詩（一六三六—一七〇四）著《古文尚書疏證》，以充分的證據辨明古文尚書十六篇及孔安國尚書傳皆為偽書，曾謂「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方法上則為「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爛如電。」^⑥，一百多年後的傅斯年還稱譽此書為

④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民國十七年廣州初版，民國六十年臺北再版），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第二冊，（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頁九七五。

⑤ 黃秀政，《顧炎武與清初經世學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七年），頁一〇七—一二二。

⑥ 閻百詩語轉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臺五版），頁二二〇—二二一。

「那末一個偉大的模範著作」⁷。此外傅氏所謂「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⁸，這種態度無疑地正是考據學者「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翻版，方法論上的假設並無不同。總之，史料學派在精神上和方法上都順應著乾嘉考據學的發展而產生。

史觀學派的主流（馬克斯唯物史觀）雖然是由外國傳入，然而余文已指出「奉天承運」的觀念是重要的背景，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檢討中國史學傳統與政治之關係，可以發現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的例子層出不窮。歷史上正統論的爭執是爲了證明政權的合法性；Michael Dennis Freeman 也指出十一世紀中國歷史撰寫是一種政治工具⁹，北方人所寫的史著中奸臣大都是南方人；不過最有意義的例子是清末康有爲的「三世說」，這種說法源於《春秋公羊傳》，也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認爲歷史的演變是由「據亂世」進爲「升平世」（小康），再演變爲「太平世」（大同），反對崇古心態所造成的退化論，隨著時間的演變，不同的階段實行不同的制度，人類會不斷地進步，最後則實現大同書上所描繪的理想世界。這種歷史觀和唯物史觀的思想模式十分類似：(1)兩者皆爲歷史演化的階段論，只是一爲三階段，一爲五階段。(2)演變的最後階段都是烏托邦世界，康有爲的太平世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3)都認爲歷史是無法抗拒的潮流。(4)都以歷史爲政治服務，爲政治運動尋找歷史的根據。因此我們認爲在唯物史觀還沒有傳入中

⁷ 同註⁴，頁九七五。

⁸ 同註⁴，頁九七六。

⁹ Michael Dennis Freeman, "Lo-yang and the Opposition to Wang An-shih: The Rise of Confucian Conservatism, 1068-1086"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1972, Ch. 4, pp. 133-168.

國之前，一些傳統的觀念已經爲它奠下了基礎，用孔恩 (Thomas Kuhn) 的話來說，即一切概念的範疇 (Conceptual categories) 都已事先準備齊全了。

我們無意將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比附爲清代今古文之爭，因爲事實的情況遠較此爲複雜，史料學派重視史料真實性之考訂受康有爲《孔子改制考》的影響，余文也指出古文派的章太炎和康的弟子梁啟超都有史觀學派的傾向；而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之背後同樣具有「科學主義」的心態。我們對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的溯源工作，只是希望進一步釐清余文之背景。

其次，我們探討余文背後所展現的章實齋、錢穆之史學思想。余氏曾深入分析章實齋，稱之爲中國二千年來唯一的歷史哲學家，也是中國傳統歷史思想之集大成者。^⑩章氏的史學思想有下列四個重點：

(1) 六經皆史說的提出——使史學脫離經學而獨立甚至可以籠罩經學，「變遷」本身的探討具有學術的價值，同時認爲六經只是古代的政典，事變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這個看法有助於「經典神聖性」觀念之破壞，具有韋伯所謂「神話祛除」(disenchantment) 的意義。^⑪

^⑩ 余英時，「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收入《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頁一八六、二〇九。

^⑪ 此觀念之介紹見高承恕：「布勞岱與韋伯：歷史對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意義」，收入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年增訂再版)，頁一四六；亦見高承恕，「從馬斯·韋伯的再詮釋談社會史研究與社會學的關聯」，收入《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民國七十一年)，頁三三。在此意義之下，章氏六經皆史說對疑古派產生影響，顧頡剛在《史林雜識》小引曾說「六經本古史料也」，他雖然把「六經皆史」的「史」化約為史料，但不承認「經典神聖性」的精神却源於章實齋。

(2) 反對「道」的永恒性——認為「道」具有歷史的性質，透過歷史研究才能充分掌握「在時間之流中演變」的道。因此史家必須「不離事而言理」。¹²

(3) 撰述與記注的分別——記注是指史料的保存與編纂，撰述則為成一家之言的歷史著作。

(4) 史學的經世精神——為學應切於人倫日用。

在以上的觀點下他對當時盛行的考據學風十分不滿，他認為學者應探求大本大原，而勿流於繁瑣，考據為「補苴罅績」，只是基礎工作。「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為功」¹³。所以「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¹⁴。而史學之異於史纂和史考是在於掌握到「史義」，史義有二層含義，一方面是「綱紀天人，推明大道」¹⁵，另一方面則為「史學所以經世」¹⁶。

因此余氏在「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一文中認為：章實齋對清代學術的批評，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將乾嘉考證和蘭克以後的歷史主義滙合之潮流中，「尙未完全失去時效」。¹⁷我們也發現余氏對史料學派的不滿與章氏對考據學風的批評如出一轍，對史學未來的展望

¹² David S.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39-190.

¹³ 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史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重印四版），外篇三，「答沈楓堦論學」，頁三〇九。

¹⁴ 《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頁五三。

¹⁵ 《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上」，頁一三六。

¹⁶ 同註¹⁴。

¹⁷ 同註¹⁰，頁二〇六。

也和章氏史學理想符合。

至於章氏觀點和近代史觀學派的關係，我們無法直接瞭解，因為「事變出於後者」章氏不能言，但是我們可以透過章氏觀念在今古文兩派的不同見解而得到一些消息。古文派重考據訓詁與章氏之旨不合，但章氏的觀點與今文派「尋先聖微言大意於語言文字之外」的基本精神相同，而且兩者同為乾嘉考據之回響，只是一從經學立場，一從史學立場。因此今文派之龔自珍深受章氏影響，他主張通今致用，重思想、發揮，不僅為個別事實之考訂，亦追求原理原則的探討，正是結合了莊存與與章實齋而成。但今文派從龔自珍到康有為的發展卻逐漸地遠離這條路子，變成了「不經不史」。郭斌蘇在「章實齋在清代學術史上之地位」一文有深刻的批評：章氏思想與今文學家有暗合之處，「惟今文學家，每言大而夸，師心自用。好以簡單之公式解釋複雜之史實。削足適履，牽強附會。流弊所及，至束書不觀為荒誕不經之議論，或且鹵莽滅裂，為實際政治之冒險。此與實齋精神根本不侔。」¹⁸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如果以章氏史學精神來批評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發現史料學派偏於「事」，史觀學派則偏於「理」，而歷史是人類以往一系列發展的行動，每一行動都包含了事與理，因此史家應不離事而言理——這樣的見解正是余文的重要基礎。

接著我們探討余文中錢穆史學的根源，錢氏在《中國史學名著》中盛讚章實齋，而且該書結束於章之《文史通義》，因為「其下無合於標準的史學名著可講」¹⁹，並指出治中國史學應跳出

¹⁸ 郭斌蘇，「章實齋在清代學術史上之地位」，載《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一卷，（民國三十年），頁五七。

¹⁹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二年），頁三三六。

道咸以下至目前之學風，而遊神放眼於章實齋之前。這樣的結束似乎暗示：錢穆將自己的史學上接於章實齋。當然我們也承認，錢穆史學已經在傳統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新的體系，這個體系對余文有重要的影響。

錢穆史學的一個重要觀念是「不站在史學立場來講史學，而是在學術全體的大流變之下談史學」²⁰，因此他希望「諸位不要把眼光心胸專限在史學上，史學並不能獨立成爲史學……學問與學問間都有其相通互足處，諸位該懂得從通學中來成專家」²¹。

我們提出兩點來討論余文中所呈現的這種精神：

(1) 余文一開始就指出：現代中國史學的衰弱並不是一個孤立而突出的現象，實際上它只是整個學術荒蕪的一個環節而已，因爲史學必須不斷而廣泛地從其它學科中吸取養料。這個看法不但點出了病因，也指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是：重振史學不能只重視史學本身，根本之途必須培養社會中整體學術的生機。

(2) 錢穆史學雖然是「社會科學史學前的史學」²²，但卻帶有開放的精神，使余氏「能出錢穆史學方法論之上，敞開大門接受社會科學的解釋法則」²³。

接著我們觀察錢穆對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批評，從這點來看，余文與錢穆史學的脈絡關係

²⁰ 同上。

²¹ 同上。

²² 胡昌智，「錢穆的《國史大綱》與德國歷史主義」，載《史學評論》，第六期，（民國七十二年），頁一六，此語主要指《國史大綱》一書。

²³ 胡昌智，「從孔思的『典範』觀念談《史學評論》發刊辭」，《史學評論》，第六期，頁一六〇。

就更清楚了。

余氏所謂之史料學派，錢穆稱爲科學派或考訂派，其缺點爲「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爲局部窄狹之研究，以活的人事換爲死的材料」²⁴，「要瞭解在方法與材料之外，尙別有所謂學問」。他並以泡茶來比喻，「一杯茶亦要好多片茶葉沖上開水，始成一杯茶，若把茶葉一片片分開，單獨泡，便不能泡出茶味來」²⁵，史料考證便是將茶葉一片片地分開，單獨泡茶。

余文所謂之史觀學派，錢穆稱爲革新派或宣傳派，此派優點爲「治史爲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結合，能求把握全史」；缺點則爲「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縮合歷史於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爲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沈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²⁶

在對以上缺點加以反省之後，錢穆指出：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要具備二個條件，一、是使人了解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的種種演變，及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二、要從歷史統貫之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作爲有志革新之參考。²⁷余文所謂「中國文化獨特型態與發展歷程」即錢穆之第一個條件，而「對過去的確切瞭解可以照明我們今天的歷史處境」、「認清勢的作用與性質，對我們眼前的處境有指點方向之功」則爲錢穆所要求的第二個條件。

²⁴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四年修訂二版），引論，頁三。

²⁵ 同註¹⁹，頁三二六。

²⁶ 同註²⁴，引論，頁四。

²⁷ 同註²⁴，引論，頁七。

上面我們從余文中承舊的一面作初步地分析，認為余文扣緊了章實齋的史學觀念和錢穆對國史的反省而展開。章氏對考據學風的不滿，錢氏對史料、史觀學派的批評都清楚的顯示在余文之中，但余文的典範意義不是單從傳統的內在演變所能解釋，章氏在十七世紀所受到的考證壓力，錢氏在抗戰時所見國人對歷史的漠視與誤解，和民國六十八年余氏的反省必然有所不同，余文的出現有其時代的意義。從整個發展趨勢來看：章實齋的歷史思想已經逼近了一個新典範，但在清代學術風氣之下，他雖想力挽狂瀾，最後卻鬱鬱而終；錢穆的歷史思想則為新典範立下初步規模，然而他的看法也沒有獲得普遍的回響，很多人對錢穆的作品充滿誤解，傅斯年甚至宣稱「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²⁸。一直到余氏，在傳統的基礎之上，融入許多新的見解，才有重大的轉變。下面我們對余文之中超出傳統史學的部分作一反省。

首先余文所面對的是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界的極端發展，因此余氏針對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的基本主張提出反省，然而極有意義的是，余文的反省中只有二派的想法，沒有提到任何一位歷史學者的名字，這種處理在方法學上屬於韋伯所謂的「理想型」(ideal type)，因為現實的史學狀況不可能那麼涇渭分明。如史料學派的主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傅斯年和李濟到今天許倬雲、毛漢光諸先生，看法不斷地調整與改變，有些人早就放棄「史學即史料學」的工作旨趣；而大陸史學界中亦有掛羊頭但內容很紮實的作品。所以我們只能說史料與史觀的劃分

²⁸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二年），頁二〇二。此語雖係錢氏晚年之回憶，真實性待考，但至少反映錢氏認為自己的看法並未被普遍地接受。

是爲討論上的方便而指出的趨勢，現實中並不是那麼清楚。但這樣的處理卻可以增加新典範在解釋上的應用，因爲這二種研究趨勢可能在不同的地區以不同的方式表現，例如中共史學從史觀折回偏重史料的舊路，國內史學界某些有心人士以歷史爲特殊的政治主張服務，或以設定的架構套歷史的現象，這些態度同樣的受到余文的批判。

其次，余氏對研究態度主張「史學研究上理性和情感是能够而且必須取得平衡」，我們發現余文中隱去了強烈的民族激情，他沒有強調「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²⁹，取而代之的是以世界的眼光觀察中國文化的特色，這一點是余文與錢穆史學不同之處。近代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之下民族意識高漲，民族主義幾乎成爲一種新的宗教，史家的著作之中都充滿了濃郁的民族情感，甚至產生民族的偏見，余氏所表現之世界眼光正是希望平衡這種民族的偏狹。在此前提下，余文所謂「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過程」之目標更具深刻的意義。然而我們禁不住的想問：民族激情和世界眼光是否無法協調？「世界史家」的境界是否必然高於「民族史家」？這些問題仍然值得思考！

爲了達到余氏所倡導的目標，他主要提出了下列幾種方法：(1)比較研究，(2)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³⁰，(3)基本功力的長期累積，(4)分析、綜合的交互運用。第三點和第四點都是切實可行，爭論和困難較少，下面我們只討論第一點和第二點。

²⁹ 國註²⁴，頁一，「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³⁰ 余文之中有時強調「吸收有關科學的方法以爲己用」，有關科學主要即指社會科學。

比較研究主要是配合上述之世界眼光，使中國文化之特色能在與其它文化比較中突顯出來，消極地說，要避免比附，不要把目標定為追求發展中的「通則」或「規律」；積極而言，比較時不但要異中求同，還要同中求異，所以異文化的歷史進展足以參證，社區研究的文化體認也可用於中國史的分析。余氏所談的比較方法對國內史學界，還是一個有待努力的方向，這牽涉到國內學者對其它文化的了解，治本國史的人多半不接觸外國史的著作，國內研究所外國史課程非常的少，甚至外國史的經典作品在國內也不易找到，這些缺陷不但「削弱了史學家提出新問題的能力」，也使史家對問題的解答不够深入。在作比較研究之前我們必須先突破這些困難。

接著我們檢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這個看法從民初以來就不斷地有人提倡，如何炳松翻譯羅賓遜（Robinson）的《新史學》，著《通史新義》，一直到近年來《食貨》與《思與言》雜誌的鼓吹，所以黃俊傑先生認為：近十年來，國內史學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徵是「史學與社會科學之理論與研究方法的結合」³¹，余文的見解正是配合這個動向。但余氏卻別有會心的提出「史無定法以切己為要」的基本原則³²。史無定法的法，胡昌智從研究程序的角度指出：不是指一般的史學研究技術——如找尋史料、考證真偽、論文與註解的型式等，而是指「社會科學提供出的解釋規則」³³，也就是說就前者而言，歷史學有其紀律，但後者則並無成法。我們嘗試以

³¹ 黃俊傑師，「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上）」，載《漢學研究通訊》，第二卷第二期（民國七十二年），頁六十九。

³² 此原則不專用於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亦可廣泛的指一切史學方法的運用。

³³ 同註³²，頁一五七。

Abraham Kaplan 的比喻作一詮釋，如果把史學研究比喻為球賽，則社會科學所提供的方法，不是裁判，也不是制定規則的委員，它只是球隊教練為適應實際狀況所提出的對策，它的好壞端賴能否有效地贏球而定。³⁴能够贏球的方法就是余文所謂的切己。然而「史無定法切己為要」之說仍然值得討論，有經驗的史學研究者對這種說法可能會認為「與我心有感戚焉」，但對初學者而言，這個原則卻十分空泛，不易掌握，令人覺得似有禪宗的意味，卻無頓悟之方，面對史料時仍然是手足無措。不過我們也願意提出粗淺的看法：史學之所以引人入勝或許正在於此，它不是一種一加一的學問，它不但需要基本功力的長期累積，更需要內在心靈的細緻領悟。

下面我們將以上的原則落實到具體的研究，余英時先生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以心理分析的觀點研究章實齋早年的認同危機；在「近代紅學發展與紅學革命」和「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兩文中以 Thomas Kuhn 的典範論來分析學術史的發展。³⁵上述的作品在方法的運用上都是圓融無礙，對「史無定法切己為要」的原則而言，具有示範的作用。

但是國內史學界中類似水準的論文並不多見，我們以民國七十年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召開的「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為例，這次研討會舉辦的動機就是以科際整合的精神促進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但就會中所提的十八篇論文分析，至少有七篇仍然堅守史學陣容，完全沒有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而一部分以社會科學理論架構所作的研究則「理論的運用與史實的

³⁴ 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七十年），頁三九。

³⁵ 「近代紅學發展與紅學革命」，收入《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見註②。

結合還不够成熟，尚未到達一種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前後呼應的地步³⁶。我們承認論文的學術水準絕不是以有無應用社會科學所能判斷，但就一個提倡科際整合的研討會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還牽涉到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今日我們所接觸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都有濃厚的西方性格，產生於特殊的歷史文化脈絡，這些理論與方法應用到中國研究時，必然有其限制性，因此民國六十九年，中研院民族所召開「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研討會，就是要追求學術研究的本土化，希望從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建立社會科學理論。這和余文所謂：脫離佛敎史上的「格義」階段，實現自創天臺、華嚴的理想境界，在精神上完全一致。但是從研討會的論文之中也顯示了一些問題，提倡社會科學研究中國化的學者，多半缺乏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入了解，也就是心思為善，其學不足以濟之，這可能使社會科學研究中國化的理想徒成具文。³⁷

檢討近年來國內學術界的發展，我們看到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都在努力，雖然面臨了許多困難與挫折，但基本上卻依循著余文之新路向緩緩地向前邁進。

以上我們分別從承舊和創新（指超出傳統史學之外的部分）的兩個角度對余文作再反省，在承舊的方面我們提出章、錢的史學淵源，在創新的方面則嘗試以近年來國內的學術經驗回觀余

³⁶ 《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頁四四八。

³⁷ 對此問題的反省見楊懋春、黃俊傑，「史學、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化」，收入黃俊傑師，《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二年）。

文。我們發現余文在表面上似無特殊的見解，背後實際上具有深厚的史學根源，尤其可貴的是它能適當的結合了傳統與現代，以此批判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再系統地指出一些切實可行的研究路向。當史料、史觀學派逐漸爲人放棄的時刻，此文「指點方向之功」，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因此，在余文發表四年之後，我們認爲余氏的發刊辭和與此相呼應的史學作品，對現代史學而言是一個新的典範。在理論層面上：他指出歷史的多樣性與發展性，而從發展的脈絡之中可以了解未來的動向；在方法層面上：他強調適當的應用比較研究與社會科學的解釋法則，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從事疏通知遠的工作；在價值層面上：第一史家應關懷時代，但要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第二應以世界的眼光超越民族的偏狹。這一系列的看法已經逐漸地爲人所接受，而成爲史學界的共識，我們相信，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史學工作者將繼續在這典範的籠罩下，從事「解決難題」的常態工作。